

□诗坛态势剖析
□诗人研究
□当代诗歌群落
□海外华语诗界剪影
□历史的沉思
□诗人回忆录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古代诗论新探
□外国诗论译丛
□姿态与尺度
□结识一位诗人
□诗学研究
□当代诗歌理论研究

诗探索



1996 3 诗探索
POETRY EXPLORATION

《诗探索》是中国唯一的诗歌理论刊物，是诗人、学者探索与争鸣的讲坛。是诗歌研究与创作者的必读书。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中心

主 办

四川矛盾实业总公司
画家石虎先生

资 助

诗 探 索

1996 年第 3 辑(总第 23 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探索:1996年 第3辑/谢冕等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

ISBN 7-5004-1976-7

I. 诗… II. 谢…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期刊 IV.
I207.2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7328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首都师范大学语文报刊社承办 《诗探索》编辑部编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河北省三河市文化局灵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5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5.50 元

目 录

· 纪念艾青 ·

- 两次不同寻常的重逢——悼艾青 牛 汉(1)
礁石依然站在这里 杨匡汉(5)
艾青的诗论 晓 雪(10)
死亡与再生：艾青诗的宗教底蕴 汪亚明(21)
用色如神的语言巨匠 张永健(30)

——浅论艾青诗歌的色彩美

· “字思维”与中国现代诗学 ·

- 字象篇 石 虎(37)
汉字人文性反思 申小龙(41)
母语，人类对世界的原始命名 胡 子(49)

——汉语诗性本质探微

· 经典重读 ·

- 批评家周末：重读《望星空》 谢 冕 洪子诚主持(57)
文本的裂隙与诗人的矛盾 刘圣宇(57)
重读《望星空》 谢 冕(64)
个人“本质化”的过程 洪子诚(65)
被改写的星空 李汉荣(66)
《望星空》：文本断裂的意义 高秀芹(67)
膨胀的星空 瞿 乐(68)
评《望星空》 [韩]慎锡赞(69)

· 读诗会 ·

- 读郑敏的组诗《诗人与死》 徐丽松整理(70)

· 诗学研究 ·

- 心理期待与阅读障碍 叶 楷(94)

·诗人研究·

“中西艺术的宁馨儿” 汪剑钊(102)

——闻一多的新诗与异域影响

·姿态与尺度·

沿着语言的边缘捕捉不知名的昆虫 李 震(114)

·关于韩东·

问答——摘自《韩东采访录》 韩 东(124)

关于韩东 小 海(129)

韩东创作简历 (142)

·诗人专访·

曾卓先生访谈录 陈 薇(143)

·诗歌精品点评·

我遥望 曾 车作 孙光萱点评(152)

·诗歌理论著作评介·

广博而深邃的“诗学工程” 苗雨时(154)

——评杨匡汉新著《诗学心裁》

建构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之力作 李庆立(159)

——评陈良运《中国诗学批评史》

·外国诗论译丛·

现代主义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

..... [英]利大英著 陈旭光译(164)

诗词对话 共商繁荣 晨 枫(175)

——“新时期诗歌与歌词审美比较研讨会”综述

世纪末的探索 方长安(178)

——’96华文诗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楚客诗歌作品讨论会”述要 剑 钊(181)

中国诗歌学会正式成立 (183)

1996年《诗探索》发行站名录 (184)

• 纪念艾青 •

两次不同寻常的重逢

——悼艾青

牛 汉

常常听人慨叹，也听人赞美，人的一生实在太丰满和悲壮了，因为几十年来经历了多少次的悲欢离合。但是，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说千家万户都有各不相同的催人泪下的故事。我已经写过两篇记重逢的文章，一篇写路翎，一篇写胡风。重逢都是近期的事，记得真真切切，写得实在痛苦。能遗忘多好！有多少次不同寻常的重逢，都应该写，但终于没有写成，多半就是由于太痛苦的缘故。这几十年来我几乎没有经历过一次正常的告别场面，不可能跟任何人告别。经过几十年之后，只能写一次一次的重逢。

我与艾青的几次重逢，都很不寻常，可以说异常的悲壮。这里先得说说我和艾青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和交情。1938年春天，不足15岁的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跟艾青学过短时期的画，当时，还不晓得他是诗人。十年以后，在华北解放区的正定，又见到艾青，他住在天主堂内的一间平房，生活非常艰苦。这一次我向他请教了有关写诗的许多问题。记得我写了几首赞美大自然的小诗，自己很得意，请艾青指教，他却说，“不要再让别人看了。”他是善意的。1949年初，一块儿进入北京。1953年，我从东北部队回到北京，跟他的接触才多了起来。直到1955年春天，还到东总布胡同多次找过艾青，我是《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

1957年5月，我由关押地回到家里，但事情并未了结，听候组织最后处理。反右斗争开始，没有我的事。大约1957年8月的某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让我去参加文艺界批判冯雪峰的会，会场设在当时的全国文联礼堂。到现在我还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参加那个会？也许是让我接受教育，进一步彻底清理自己的问题。我感到很为难，甚至有点惶恐，但不敢违抗。那一天，我穿了风衣，把帽沿拉得低低的，一进会场的门，就让当时的作协秘书长认了出来，他惊讶不已，我把入场证让他看看，他没有说一句话。我到得晚，会场上已坐满了人。本来想找个靠边的角落躲起来，找不到，只好跟人挤在一起坐。挨着我坐的正好是熟人洁泯，他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关心地问我：“没事了吗？”我说：“还没结束。”会场中央有两排从东到西的长长的桌子，面对面地坐着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和革命作家。我低着头，等着开会，生怕熟人发现我，会场上熙熙攘攘的很不安静。我望见丁玲来开会，陈明跟在她身后边，我想冯雪峰一定已在会场上，张望了几次，都没有找到，我非常耽心雪峰的命运。

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低着头，不准备答应，喊声相当高，没听出是谁。于是又“牛汉、牛汉”地叫了好几声。我只好抬起头，望望喊我的人，哦，原来是艾青。我们相距有一丈来远，艾青直盯着我，问：“是牛汉吗？”我点点头。他用更大的声音关切地问我：“你的事情完了吗？”我回答说：“没有完，算告一段落了。”旁边好多双惊奇的眼睛审视着我和艾青，我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反革命分子”，而艾青正在受着严厉的批判。想不到艾青竟然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很大很亮，不是朝着我，而是面对大家，几乎是用控诉的声音，大声说：“你有问题告一段落，我的问题开始了！”接着他用朗诵诗那种拖腔高声地喊：“时——间——开——始——了！”谁都知道这是胡风一首诗的题目。（《时间开始了》出版时封面是由艾青设计的，没有署名。是胡风当时对我说的。）艾青像一尊青铜雕像似地立在那里的神态和他的悲壮的声音，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我相信

当时在场的人也决不会忘记。

1955年到1957年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是被单独囚禁的，不准看报，完全不知道艾青当时的处境，实际上他经历了与我相似的灾难。1955年反胡风时，他没有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在劫难逃。1956年掀起所谓丁陈集团问题时，就把他牵扯了进去，直到1957年反右，“时间”果然“开始了”。他可以说没有安生过一天。艾青那一天愤激的情绪几乎是爆发性的，仿佛挥写着一首溅血的诗似的。当时坐在他附近的人，有几位是文艺界的领导，也就是整他的人，但他毫不畏惧。艾青毕竟是写《向太阳》、《火把》、《芦笛》等诗篇的正直而勇敢的诗人。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思考一下了。我以为艾青当时绝不是不顾一切的那种感情冲动，如果说这是冲动也是冷静和清醒的冲动，是真正的诗人的冲动。在人生的逆旅中，他已经经历过不少次严酷的考验，不是不晓得他当时的冲动会引来什么样的后果。在那一段时期，他当然思考过很多问题，回顾和审视了他的一切的一切。（那些年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审视和拷问过自己的灵魂。）艾青敢于大声地表白自己，是对人生最根本的抉择，否则，他就不是一个真诚的人和真诚的诗人。他清醒地理解这一点。

我与艾青的这次重逢，难道可以忘却吗？

恍恍惚惚地度过了20年……

又一次不同寻常的重逢。1976年的冬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拐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颧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于是我走到前面去就近看看，果然是分别近20多年的艾青，他也在排队买猪头肉。我禁不住喊了他一声：“艾青！”（这一次是由我喊他了！）艾青怔怔地望着我，一下子认不出我是谁：“你是谁？”他望望我高高的个子，想了想又问：“是牛汉吧？”我说：“是牛汉。”艾青哪

嚷着：“咱们都活着……”艾青和我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想不到他在我的面颊上实实在在地亲吻了一下。我和他早已忘记了买猪肉头的事，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爽朗地笑了起来，我已经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从新疆来，住在他妹妹家，他的右眼失明了，是来北京治眼睛的。他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一向粗心的我把门牌号忘了，几次找他都没找到。一两个月之后，才在西城王府仓4号找到了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空架着防地震的东西。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来过许多次，艾青没有稿纸，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通过私人关系为他弄到一千张稿纸。

本来我想把这一节两次重逢的文字，起名为《在浪尖上的艾青》，觉得不够含蓄深沉，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小题。这考虑我以为符合艾青的性格，他本是一个很朴素平和的人，而我却一向很躁动，艾青不止一次提醒过我：“牛汉，做人做诗要再朴素再深沉些。”

这一节文字，我改了三四次，一次次地将躁动的情绪压抑了下去，真实决不可涂抹掉，因此写得太痛苦了。

（责任编辑 刘福春）

礁石依然站在这里 ——纪念艾青的逝世

杨匡汉

1996年5月5日凌晨4点15分，一颗伟大的诗心停止了跳动。此时此刻，久旱的京都上空骤然飘落蒙蒙细雨。细雨默默地送诗人的灵魂飞上天际。

任何人无法抗拒生命的自然法则。但艾青死得如此圣洁，他陨落得如此美好！尽管按照他“不要兴师动众、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但分散在天南地北的文明诗友，都不约而同地赶来再看他一眼，再送他一程。人们面对“含着微笑，望着海洋”的艾青遗像，默诵着《大堰河——我的保姆》，默诵着《礁石》《火把》《我爱这土地》为他送行，泪雨纷纷，永远告别了和艾青结成的最富于诗意的友情。

活了整整86岁的艾青，是我国20世纪跨时代——从“现代”到“当代”的少有的终身诗人之一。大自然给了他一个家庭，而他的诗又为他缔造了第二个家庭。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新诗事业，成千上万的人因艾诗而获得了他灵魂里的爱情。诗像一条看不见又拧不断的纽带，把艾青和经尽苦难而追求光明的人们联系在一起。艾青在晚年多次跟我说过：“我始终是大堰河的儿子”，“我始终是旷野的儿子”。这两个“始终”，这“大堰河”加上“旷野”，表明了他对这片故国土地爱之真切、爱之深沉，以至于眼里常常含着泪水——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

风雨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这种沉郁、厚重又不失期望黎明的“故土情结”，是艾青的诗歌旋律，也是他的人生信条。艾青是个爱国主义者。他曾向我提及两件往事。一是在法国时，他看到报纸上登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中国妇女和孩子，女人的胳膊少了一只，因为闹水灾，人吃肉吃掉了。报纸上竟然宣传：法国人是上帝的儿子，应当去拯救中国。艾青气炸了：这是帝国主义的宣传！“拯救”就是侵略！二是1932年初的一天，艾青在巴黎郊外写生，一个喝醉了的法国酒徒走到跟前大声嚷嚷：“中国人，国家快灭亡了，你还在那里乱画画！”洋人的醉语深深刺激了艾青。他不愿受凌辱、做奴隶，当即决定回国，并到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文艺团体，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成为囚徒，并在狱中开始了写诗的生涯。

在灾难的岁月，在民族悲愤和抗争的时代，中国真正的文学，是一种诗人和作家遭到放逐的文学，是遭受多方面预谋的迫害但仍然有各种才华在充满暴风雨的领地里生长百花的文学，是不在豪筵上为屠伯赞歌却能得到无数用血肉去思考、用理智去判断的人们的保护的文学，是无暇顾及奥林匹斯山但和平型关连在一起的文学。艾青认定：“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忠实的代言人。”三四十年代是艾青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接连为中国文坛贡献了《大堰河》《复活的土地》《北方》《旷野》《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火把》《雪里钻》《黎明的通知》等多部诗集，鼓舞着苦难中为争取光明而奋斗的人民，也影响着同辈以及后辈的诗人。

中国的新诗，由胡适开其端，郭沫若奠其基，闻一多、戴望舒、臧克家、冯至等诗人悉心经营，至艾青遂成殿堂。艾青本人作为艺术斗士的使命与责任感甚为强烈。他的格言录式的《诗论》，几乎涉及了诗歌美学的全部领域。他在理论与创作上的努力是建设性的，并往往作用于新诗发展的前沿。他十分重视诗的内容：“假如是诗，

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他也重视诗的形式，但主张：“宁愿裸体，却决不要让不合身材的衣服来窒息你的呼吸。”他揭橥“诗的散文美”的新帜，尽管这一知识命题是否具有科学性尚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讨论，但如果把它同倡导“自由诗”、反对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去理解，我们仍然可以确认：艾青呼吁解除任何凝固陈旧的程式对于新诗的束缚，力主以接近口语而有自然韵律的白话投入与时代脉搏相呼应的抒唱，正是促进诗歌现代性健康发展的一种积极姿态。

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和而不同”。“以他平他之谓和”，“和”即是不同诗风、诗派、诗格相聚集而达至平衡，达至多样性的统一；“不同”即以敏锐而独特的艺术感受，以鲜活而独创的语言表达，以无可重复的审美个性，去挥洒时代悲欢、人世春秋。艾青的诗，有着和人民的哀乐相一致的悲欢，却又是极富个性的——他诗中的自我有独立的人格，也有阔大的胸襟。这是“礁石”的形象：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望着海洋……

对于这首诗，不同的评家有不同的评说，产生过理解上的歧义。“礁石”这一客体物象被诗人心灵化以后，有人认为是指屹立于大风浪中的中华民族；有人联系其写作年代背景——反帝反殖斗争的国际浪潮，断言“礁石”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承受打击而从不屈服的象征；也有人认为是诗人高傲品格的自我写照。我曾请教过艾青，他回答得很豁达：“读者随便怎么理解都可以。要允许别人根据不同的经验去体味和想象。不过，有人总不赞成用‘礁石’这个形象，说是暗礁常常撞翻航船。我要说，航船是人开的，人有眼睛，可以躲开走呀。‘礁石’并没有损害别人嘛。”看来这又是一解：诗人的意图是传达某种深刻的人生经验和人生哲理。

中国文学在五、六十年代有过早春的欢乐，却也逐渐演出过不

少悲剧。由于过分迷信战时意识形态，过分迷信非 A 即 B 的二值逻辑，谁要是同“主流”有稍稍的偏离或对撞，谁就要吃点大大小小的苦头。艾青说过一些并不“紧跟”的话，写过《养花人的梦》一类不合时宜的诗文，就被打入“另册”。先是去北大荒，后又转至新疆“劳动改造”。“文革”中复被当作“死老虎”，赶到一个称作“小西伯利亚”的地方去种菜、去打扫厕所。从 1957 年到 1978 年底“平反”，熬了整整二十一年，做了整整二十一年噩梦。每一页都是痛苦的回忆，艾青说：“真像穿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平反时说‘搞错了’。哎，‘搞错了’，三个字，一个字顶七年。我回答说‘俱往也’。我不是右派，但也不是左派，我什么也不是，艾青就是艾青。”

艾青就是艾青！诗人写过《他死在第二次》，诗人自己又活在第二次。沉默中归来的艾青，很豁达地以公正对待不公正。他言行一致——“从生命感受了悲与喜、荣与辱，以至诚的话语报答生命”。他捐弃门户之见，没有亲疏之别。他几乎信任每一个走近身旁的人。他一再表白要敢于讲真话，说老实话。他反复强调人生之不易，诗人不能泄气，要有骨气，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他告诫后学要直面人生，桃源在世间，不在世外。饱经沧桑的诗人自己也再度辉煌。复出后十多年，写了近二百首诗，成就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高峰期，《光的赞歌》、《虎斑贝》、《绿》、《盆景》、《仙人掌》、《墙》、《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等名篇为人们广泛传诵。那礁石，那鱼化石，好像一接触到火又燃烧起来。他不再用“嘶哑的喉咙”歌吟，而以对于人的价值的确认，为“生命就是燃烧”的信念而鼓与呼：

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这依然是当年高举火把迎向太阳的艾青，却又是将诗中的自我推及足以拥抱自然和宇宙的艾青。他豁达而清醒的话语反映了深沉的灵魂，他的生命慨叹表述了辩证的哲理。

记得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里说：“通常的看法是炽热的青年时期是诗创作的黄金时代，我们却要提出一个相反的意见，老年时期只要还能保持住观照和感受的活力，正是诗创作的最成熟的炉火纯青的时期。以荷马的名字流传下来的那些美妙的诗篇正是他的晚年失明时期的作品。我们对于歌德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只有到了晚年，到了他摆脱一切束缚他的特殊事物以后，歌德才达到他的诗创作的高峰。”这句话也适用于艾青。及至晚年，艾青摆脱了庶务也摆脱了那些束缚他的“特殊事物”，他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他的心理年龄并没有衰老，他能“冷眼向洋看世界”而保持着观照和感受的活力，使他拥有了历久不衰的创作青春。这一点和当代美国大诗人弗洛斯特有所相似又不相同。弗洛斯特享年八秩晋八，也是垂暮之年仍有诗作问世，和艾青相似。但弗氏的佳作基本上是40岁成名之前发表不了的那些退稿，名气大了以后的作品很少能超过少作，入世愈深，城府愈深，缺乏活力，多有“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做作；艾青则显然不同，及至晚年仍保持一颗年青的赤子之心，真诚歌哭，响遏行云。“不怕守火的鹫鹰/要啄掉他的眼睛/也不怕天帝的愤怒/和轰击他的雷霆/把火盗出了天庭”，此等笔力，快利无双，踔厉发越，气焰光采，哪里有一点迟暮之气？

艾青去世前我最后一次去他家里，是代一家青年杂志向他索求墨宝。他写好了三张“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随我们挑选。他把诗视为“牧歌”，是希望真善美自由而圣洁的声音永远飘荡在生活的旷野上。这声音由于信仰而趋向丰富，并非天鹅临死前的告别，而是凤凰在灰烬中再生时的歌唱。正因为如此，聂鲁达生前称艾青是“迷人”的，是“中国诗坛的泰斗”，而茅盾则认为“艾青是中国当代屈原之一”。

根据东方传说，一滴眼泪落在海里就会变成一粒珍珠。斯人已逝，但礁石依然站在这里，那泪神化作的诗篇，永远似珍珠闪亮。

1996年5月末，北京

（责任编辑 林 莽）

艾青的诗论

晓 雪

艾青是中华民族的诗坛大师，是我国现当代现实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是继郭沫若之后中国新诗的又一面旗帜，也是世界诗坛具有广泛影响的巨匠之一。不论在诗歌创作或诗学理论上，他都深刻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各民族的一代又一代诗人。

艾青的诗学理论著作，影响最深远的当然还是他将近 60 年前写的《诗论》和《诗人论》。但此外他还有大量谈诗论诗的讲话和文章，包括逝世后才在 1996 年第 5 期《诗刊》首次发表的他 1957 年 8 月 20 日在文学讲习所《谈诗》的长篇讲话。特别到 80 年代，他又写了新的《诗论》。这些著作中有一系列关于诗歌美学的真知灼见，反映了诗人在长期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对诗学理论作更广泛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丰富成果。1991 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艾青全集》中，诗论占了一卷近 50 万字。我 1982 年 5 月在杭州为纪念艾青创作 50 周年而召开的“艾青研究学术报告会”上提交的论文《艾青的诗美学》，主要根据艾青早年写的《诗论》和《诗人论》，对他的诗美学作了初步的探讨。最近，在沉痛悼念诗人不幸逝世的日子里，我又重读了他的全部诗论著作，再写此文谈谈自己进一步学习艾青诗学理论的体会。

—

1995 年 11 月 29 日，我同周明、王昆等一起去看望艾青时，他曾反复讲过这样一些话：

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这是我的话，你理解得很准确，很深。过去没有人注意到，你注意到了。你的书名《生活的牧歌》取得很好，抓住了我的最主要的特点，我一辈子就是唱生活的牧歌。一个人一辈子抓准一个问题、看准一个人很不容易，你看准了我，你抓准了问题！我就是唱生活的牧歌，我没有歌颂别的什么东西，我歌颂生活！

这是我敬仰的诗坛泰斗最后对我说的颇有些过誉的鼓励性的话，但也表明他非常重视诗与生活的关系。诗，源于生活，“歌颂生活”。“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这正是他的诗美学体系或诗学理论大厦的一个基础性、根本性的观点。

与那些把诗说得神乎其神、虚无缥渺、“不食人间烟火”的种种论调相反，艾青的《诗论》中专门有一章叫《生活》，他反复强调：“我生活着，故我歌唱。”“生活是艺术所由生长的最肥沃的土壤，思想与感情必须在它的底层蔓延自己的根须。”“生活实践是诗人在经验世界的扩展，诗人又必须在生活实践里汲取创作的源泉，把每个日子都活动在人世间的悲、喜、苦、乐、憎、爱、忧愁与愤懑里，将全部的感情都在生活里发酵、酝酿，才能从心的最深处，流出无比芬芳与浓烈的美酒。”正因为如此，他进一步认为：“愈丰富地体味了人生的，愈能产生真实的诗篇。”“只有忠实行生活的，才说得上忠实行艺术。”“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音节，就是生活的拍节。”在1985年写的《诗论》中，艾青把他的这些论断上升到“诗的生活规律”、“艺术规律”的高度。他说，诗人必须“从现实生活出发，从实践出发，从发展中的现实出发，从变化中的现实出发，不要从形而上学出发。”“艺术规律从属于生活规律。诗的发展道路是沿着生活的规律、社会的规律而前进的。”

当然，要反映和歌颂生活，要不断地唱出丰富多彩、独特新颖、激动人心的“生活的牧歌”，诗人绝不能冷冰冰地做生活的旁观者，而必须满腔热情地去热爱生活、拥抱生活，必须全心全意地去深入生活、感受生活，必须真诚执着地去捕捉生活、开掘生活，必须使诗

人自己的主观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客观世界真正交融和结合起来。根据自己的丰富的创作经验，艾青指出：诗人必须把自己的“心理活动也溶浸在生活里面；而不能在生活里做一次‘盲目飞行’。”“诗人必须是一个能把对于外界感受与自己的感情思想融合起来的艺术家。”诗人必须“用自己的脑子去认识事物”，“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必须“更富有狂热，更善于冷静，憎恨得更深，爱得更固执”。这样，才有可能创作出有艺术魅力的诗篇。

二

艾青是在监狱里为了“控诉”和“抗议”而拿起笔来写诗的。他的诗论诞生在抗日战争的血火硝烟之中，成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此他写诗、论诗，对诗的评析、理解和要求，都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性和极其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写诗而写诗，也不是仅仅为了宣泄个人的某种情绪，他主张诗人应当成为时代的号手、人民的代言人，必须为人民而唱、为时代而歌，他认为真正的诗必须唱出时代的感情、人民的心声。

他说：“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真实的记录。”

他说：“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正在期待着、剔选着属于它自己的伟大而独特的诗人。”而“属于这伟大而独特的时代的诗人，必须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领受每个日子的苦难像是那些传教士之领受迫害一样的自然，以自己诚挚的心沉浸在万人的悲欢、憎爱与愿望当中。他们（这时代之诗人们）的创作意欲是伸展在人类的向着明日发出的愿望面前的。唯有最不拂逆这人类的共同意志的诗人，才会被今日的人类所崇敬，被明日的人类所追怀。”

他说：“诗人既要有和人民一致的‘政治敏感性’”，更“要有和人民一起的‘政治坚定性’。”“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同回答。”